

MPRA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Linguistics

Zhang, Weiguo and Liu, Guohui

May 2009

Online at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18355/>
MPRA Paper No. 18355, posted 08 Nov 2009 12:21 UTC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一个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Linguistics**

张卫国 刘国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语言经济学研究所

Weiguo ZHANG & Guohui LIU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

通信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 250100

Email: sduzwg@126.com

*本文是在第一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框架》（山东大学，2008 年）第4章的基础上删减并改写而成。作者感谢导师黄少安教授的精心指导。当然，文责自负。

Abstract

Language planning refers to a kind of humanly-conscious intervention within certain limits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selection. It has not only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language itself, but is far more involved in such issues as the adjustment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people or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through language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on language planning is mainly based on sociolinguistic theories, which tends to emphasize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this area so that, at the macro level of public policy, neither practical nor reasonable measures have been able to brought up. The economic rational-choice theory and the cost-benefit analytical method, however,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weaknesses of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greatly enrich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lan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details,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feasibility of conducting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se two issues, and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he new-rising economic analysis on language planning.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economics of language, comparison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一个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

内容提要：语言规划是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它不仅是对语言本体的规划，更多的牵涉到透过语言问题对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语言规划的传统分析主要立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往往强调这一领域的概念和基本范畴，在公共政策的宏观层面上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合理措施。而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不足，丰富了语言规划的发展。本文详细评述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内涵与外延，讨论了对二者进行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意义与可行性，并对语言规划的传统社会语言学分析和新兴的经济学分析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经济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 H002; F069

[文献标识码]A

语言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们有意识地影响其发展的活动由来已久，例如中国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政策、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复兴等。今天，对这一领域的活动我们称其为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中国近百年来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国语运动以及建国后出台的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推广普通话运动等也都是语言规划。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语言规划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语言政策与规划原本属于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宏观研究领域，是社会政治与语言学知识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学开始叩击着语言规划研究之门，陆续有经济学文献对语言规划进行研究。目前语言规划已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关于语言经济学的详细介绍与评述参见：Grin, 1996b; 张卫国, 2008a, 2008b）。那么，语言规划的经济学研究与传统研究有哪些不同，能解决哪些问题？又有哪些优点和不足？二者间能否沟通和融合？本文着重在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规划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经济学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评述与研究。

1. 传统语言规划理论：内涵、外延及其指导思想

“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引入语言学术界的，他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Haugen, 1959）。后来，豪根对此做了补充，“现在我宁愿将其（1959年的定义——笔者注）视为语言规划的一个结果，它是实现

语言规划工作者所做决策的一部分。语言规划的核心是‘用选择的方式，对现有的语言形式进行判断的活动’。简言之，可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Haugen, 1972, p. 161）。同时豪根认为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中的一个部分，据此他也有过一个更具一般意义的语言规划定义：“为一个言语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过程的活动”（Haugen, 1972, p. 287），也就是说，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语言规划刚刚提出的时候只有语言学家进行研究，尽管语言规划远非那么简单。后来，学者们不断修订或改用这个概念，使语言规划的内涵不断扩大，既包括社会语言，也包括社会整合当中跟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这也使得不少其他学科的学者关注起语言规划来。

对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有学者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Gottlieb（1994，转引自Carroll, 2001）将二者定义为“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工程化的语言改变。语言政策是规划者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制定并实施的特定策略”，Gottlieb & Chen（2001）又补充说：语言规划是有意识去指导、改变或保留一个社会语言代码的习得、结构或功能分配的努力。语言政策指的是由权威机构来进行的这些活动的系统性规划。Tollefson（1991）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规划是所有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变体的结构或功能的活动，语言政策是由政府所从事的语言规划（p.16）。Ager（2001）则用“语言规划”表示那些由个人或集体从事的非官方的活动，用“语言政策”特指官方的行为。其实，Tollefson、Ager和Gottlieb & Chen的这种以行为主体做出的区分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政策”和“规划”的含义或者说它们的所指范围可大可小，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狭义上的区分。从广义上，任何的规划或政策都是不分官方和非官方的，如每个人对待语言都有他自身的政策，偏爱也好，厌恶也好，而官方评价或处理语言问题的行为与活动当然也是一种规划。还有一些区分是从主体选择和行动以及先后次序的角度做出的，这也有一定的道理。Bugarski（1992，[转引自Schiffman, 1998])认为，语言政策指的就是一个社会在语言交际领域的政策，这些地位、原则和决定反映了社区群体与其可操用语言、交际潜力的关系；语言规划是在语言政策框架内所采取的一系列作用于社区语言交际上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常用来指导语言的发展。路易—让·卡尔韦认为，“语言政策是指关于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对某种语言政策的实施，也就是付诸行动，则是语言规划”（2001，第114页）。也有人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对二者做了简单区分。Phillipson（2003，p.15）认为，语言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集成部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以及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是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作为语言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语言规划与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和语言学有关。这个区分是源于Kloss（1967）对语言规划本身的一个划分。

不过，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这一领域的大多数文献对二者没有做详细的区分，或者有的干脆不提语言政策。说语言规划是有意识选取的语言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道理。换一个角度，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策和规划又都是关于选择的问题，说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没有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中含有规划，规划中也包括政策，这是一个广义和狭义的问题。因此，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区分开也好，不区分开也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除开上述的区分，传统语言规划理论对语言规划本身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的是，语言规划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这一学科领域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扩大的。下面选取一些有代表性观点的加以评述。有些早期的理解局限在现在看来的语言本体规划上。这种观点认为，语言规划是有意识去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努力，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语言的活动，包括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等方面，是对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正字法以及语义方面进行选择、规范和加工（Tauli, 1968）。Kloss(1967)发现语言规划不仅仅是停留在字母符号、拼写和词汇发展等语言的内部特征，即语言本体上，还应该考虑一种语言与其它语言相接触的环境，即语言地位。他认为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作为自主的语言系统的语言，一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以这两种不同的语言观为基础，他进一步划分出：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即关注语言本身或语言内部结构的规划；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系指某一特定社会中，为了改变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和功能而付出的种种努力（Kloss, 1967）。此后，学者们对语言规划有了新的认识，对规划的内容做了补充。这一类解释保留了前人的一些观点，即语言规划是有意识地试图解决语言问题的活动和努力，并基于Kloss的划分，认为其对象为语言系统本身或语言应用，或二者兼而有之（Karam, 1974）。其主要任务是解决问题，它的特点是通过制定和评价各种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以寻求最好（或最优，最有效）的决策（Rubin & Jernudd, 1971; Jernudd, 1991）。Baldauf Jr.（2004）赞同这种观点，并且认为语言规划除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之外，还应该包括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①，其中习得规划是从Cooper（1989）借用而来的。更多的定义则集中在对规划本身的理解上。规划的对象当然是语言，或者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资源，或者当作交际工具，目的是解决或干预语言使用的问题，进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或缓解民族矛盾，主体是国家以及由专门为此目的而建立或得到授权的机构。持这种观点的有：Fishman（1974）、Eastman(1983)和陈章太（2005）等等。

随着其它学科的介入，语言规划的外延不断扩大，人们对语言规划产生了新的理解。

^①习得规划是指致力于语言学习、语言推广和语言普及方面的努力；声望规划是旨在增强某种语言的社会声望的规划。

语言规划已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完全属于语言学的活动,而是一种为了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政治和管理活动(Jernudd & Das Gupta, 1971),或者说,通过对语言的干预,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种方法(Weinstein, 1980),也就是说,语言规划问题既有语言学的,也有非语言学的(胡壮麟, 1993),它也涉及私人或社会团体的努力,大多情况下指当地政府、教育、经济或语言权威部门。Mühlhäusler (2003)甚至认为,按照生态学的观点,语言规划是一种旨在保持人类交际系统最大多样性的活动。

以上关于语言规划的研究,虽然不尽相同,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了语言规划的许多本质属性。为什么人们对语言规划有着这样或那样认识,还要综合考察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及其流派。我们更倾向于换一种角度或思维来分析研究语言规划(如从经济学的角度,尽管有时不一定得到其它流派的认可,但无疑是对语言规划的一种扩展,足以加深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或引起某种的反思,这一点也正是后文中将探讨的),所以这里暂不对以上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做过多的评价。

事实上,语言规划内涵如此之丰富,反映了其自身的高度包容性,换句话说,不同流派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这也反映了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的不同。影响语言规划制定的重要思想主要有:语言多样化、语言同化和语言民族主义、语言纯净化、语言国际化和语言本土化(Cobarrubias & Fishman, 1983)。语言多样化的思想是倡导多种语言在社会中并存,用大众观点来说,旨在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同化的思想认为,人人都应该说、会用本国或本社区的优势语言。语言民族主义介于语言多样化和语言同化之间,一方面强调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应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国家是多民族语言国家,终归要选择一种或几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该思想又难免不带有一些语言同化的思想。语言纯净化可以看成是对一种语言形式的理想化的情感或理想化的态度。这种理想化的语言通常指书面语言,该书面语与日常口语相脱离,并与特定的审美价值抑或道德价值相联系。这些价值代表了该语言社区的社会思想,并且成为规范。语言国际化是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实行的语言规划思想,它认为国际语言有利于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有利于推进本国的现代化,有利于发展本国的对外贸易和科学技术,所以常常选择一种国外的通用语言作为本国的官方语言或教学用语。语言本土化与语言国际化相对,提倡选择一种或几种本土语言作为当地或国家主要的交际工具和官方语言。

2. 语言规划的经济分析: 意义与可行性

纵观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流派及其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所下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说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语言规划是一个庞杂的

系统工程，是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它不仅是对语言本体的规划，更多的是语言应用的规划，甚至牵涉到透过语言问题对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因为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因素往往制约或影响着语言规划），旨在影响人们对语言及其相关的选择，让语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世界各地普遍适用的语言规划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对语言政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指导。除了各国的个案情况不同外，语言规划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评价一种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的好坏？评价标准是什么？它的依据又是什么？^①如何既能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又能解决语言多样性带来的交际或交流不便？这些都一直困扰语言规划者和研究人员的难题。

有人曾提出过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从规划者的角度出发，Cooper（1989，p.98）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谁是规划的制定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Haarmann（1990）则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要理解语言规划的总体影响还应该考虑谁接受规划规定？接受什么规划规定？从哪儿接受规划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规划规定？很显然，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语言规划已经不单纯是语言学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问题。语言规划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要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完善自己。

语言经济学的介入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给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带来了新的思路。宽泛地说，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张卫国，2008b）。Grin（1996a，p.31）曾从经济学的角度给语言规划下过一个定义：旨在增加社会福利水平而解决语言问题所付出的一种系统的、理性的和基于理论的社会层面上的努力。它通常由官方机构或其代理人加以实施，对象是他们所管辖范围内的部分或全部居民。可以看出，经济学至少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两个方面显得有用处：**一是在理解语言相关的选择过程方面，是这些选择影响了经济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影响了这些选择。**有的经济学家研究了语言变量如何影响经济变量（如，第二语言技能导致高收入）；有的经济学家则研究经济变量对语言变量的影响（如，国际贸易促使某些语言的传播或衰落）；**二是在选择、设计、实施和评价语言政策方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是分析语言规划的有利工具；可以很好地评价语言政策的效果。这里并不是

^①尽管语言规划理性选择学派涉及到了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评价方法，但在评价指标的选取或评价标准的依据以及评价结果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说语言政策一直没有被评价,问题不在于某一政策或政策措施产生了正的或负的外部性(如,改善了或恶化了某种少数民族语言),而在于所谓的“内部效益评价”(intern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内部效益评价把人们限定在特定的政策措施中的。比如,人们(经常)评价特定年龄段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是否增加要看是否在小学中开设了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然而,和其它政策相比,如何说服公众,一种政策比另一种政策更需要优先实施或拨划更多的资源,这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可能出现多种语言政策的选择(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改善既定语言与在其它社会语言中的地位);其次,国家或社区的其它政策不一定产生语言问题,但也需要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就需要一种外部效益评价(extern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此时,只确定特定的措施以满足既定目标是不够的,还要满足其它两个条件:1)目标必须用一个共同的测量单位表示;2)评价政策的成本收益需要考虑政策的投入资源量。如果政策间相互比较,则必须使用同一测量指标来评价各种政策的投入资源。在衡量语言政策的效果方面,语言经济学以某种标准来显示这些效果,并能使结果指标与每项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们能够以共同的标准来比较那些完全不同的政策,而这个标准就是成本——收益(cost-benefit)分析^①。拿语言的教育政策来说,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时,为什么某些语言要优先于其他语言;第二语言对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影响如何?语言教学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传统分析所不能回答的。而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回报率的研究

(McManus, 1985; Grin, 1995)、关于语言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如Grin & Vaillancourt, 1998, 1999)、关于语言政策成本问题的研究(如Vaillancourt, 1996, 评估了Quebec语言政策的成本)将对上述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或解释。

此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帮助语言规划者们决定应该干什么和指导他们怎么干(Grin, 1996a)。例如,如果语言政策基于分配(资金分配、成本分配和语言权利分配),经济学理论,更确切地说是理性选择理论则有助于找到分配中效率兼顾公平的方法。Grin & Vaillancourt (1999)建议,语言政策也可以像教育、健康、城市规划或环境政策一样,由政府从税收中拨款,进行再分配。原因如下:首先,“不参与不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做法可以适用于语言政策,比如如果X语言一直是某些人的第一语言,并且X语言历史上和文化上一直是合法语言,可以实行“政府不提供语言服务就不对其使用者征税”(no taxation of speakers of language X without provision of services to them in language X)的原则。其次,事实上,如果两种语言X和Y一直按相同的税制来征税,而政府只提供

^① Grin 提出了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这一概念,是指最终评价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收益。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经济学意义上的收益本身就是包括了效率的含义。

或主要提供Y语言服务，这说明政府把X语言纳税人的钱重新分配给了Y语言的使用者（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来年，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反过来，如果Y是濒危语言，而X是优势语言，上述做法出于保护濒危语言的目的是可取的（在旨在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下，这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做法一般不会引起争议）。Pool（1991）分析了成本分配的问题。他建议在多语言政体中（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超国家实体，如欧盟），选择适量的官方语言。他的模型中要求语言规划者在众多选择中，选择总成本就小的语言，使之成为有效率的官方语言。成本可以按照语言群体或社区相应的人口比重均摊下去。尽管存在着技术性困难，对于探索语言政策中的成本分配原则仍然不失为有价值的尝试。Grin(1996c)的地域多语模型，则为多语国家中语言权利分配提供了思路。总之，经济学有助于探究那些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选择和设计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政治辩论的层面上。

最后，需要指出，经济学对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分析和大多的语言政策分析一样，主要讨论地位规划的问题，而非本体规划。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体规划可以被看作是广义上的地位规划的一部分。语言规划意味着在一个自然发展的系统（即语言）中引入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重点在制度，而非本体，也就是说，它规划的重点已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Halliday, 2001）。

3.语言规划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之比较：差异性与互补性

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传统分析主要立足于社会语言学(特别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往往强调的都是这些学科的概念和基本范畴，而真正应用的范围比较狭窄和单一，例如，传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分析有关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特别多。

基于上述学科的分析自然有其优势，但也有不足。主要的优势在于，提出的政策建议通常显示出它们对于语言这种人类经验核心要素的深入理解，以及对语言习得本身的敏锐观察。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在公共政策的宏观层面上无法有效地提出有关语言教育或改革的合理措施，而这往往是决策者所真正需要的。

另一个方面，语言规划主要是调整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具体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政策，保护多样性也好，语言同化也好，是基于各国实际国情而定的。在一国经济并不发达之前，或当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或延缓经济发展时，有可能语言同化的思想占了上风；而当一国经济已经达到某一特定水平，或当语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趋向很小时，语言政策的制定则有可能主要基于政治辩论。但无论怎样，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都要有一个评价标准或机制。政策评价有多种方法。一些方法强调解构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来支持某种政策，进而描述这种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方法常常表现出解释学的倾向，它们主要关注如何解释一种政策，

揭示和展现政策的真实目的和最终结果。其它的方法则有某种更详尽的评价倾向。它们列出一些社会语言学或人口语言学中的变量有规则的变化（如，总人口中既定年龄段的讲某种语言的人口比例），把这些变化和特定的政策（如，规定某种语言作为学校的选修课程）联系起来，认为是政策导致了这些变化。这两类方法经常结合出现在一些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文献中，很难说哪一种更有效。而语言经济学着重衡量政策的效果，以某种标准来显示这些效果，并能使结果指标与每项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们能够以共同的标准来比较那些完全不同的政策，这个标准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包括语言政策带来的语言使用过程中总成本和总时间；收益或效率可以通过语言政策的影响来评价。目前，语言经济学在关于语言政策效果宏观评价研究上已取得不少成果，例如，Vaillancourt(1996)评估了 Quebec 语言政策的成本；Grin & Vaillancourt (1998, 1999) 对新西兰、威尔士、爱尔兰和巴斯克语 (Basque) 国家语言政策的评价。当然，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语言政策意味着经济学家关注的是语言政策的问题导向 (problem-oriented)，而非交互作用导向(interaction-oriented)。问题导向的视角关注政策问题的原因、政策的解决方法以及解决方法对初始问题和政策环境的影响等，也就是说，它着重解释问题和解决方法之间的关联度。相反，交互作用导向的视角，主要涉及政策计划能够被实施执行的条件，以及社会成员间利益冲突如何导致最终的政策结果。简言之，在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问题导向的政策分析在先，交互作用导向分析在后 (Scharpf, 1987)。Grin (2000) 总结指出，以往对政策分析的经济学视角是问题导向的（如 Stokey & Zeckhauser, 1978），尽管随着博弈论的兴起，以博弈论为主的交互作用导向分析成为可能（如 Hamburger, 1979; Hargreaves & Varoufakis, 1995）^①。但是，博弈论本身只是分析宽泛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已，即那些政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导向的视角认为，首先有问题存在，然后才有对问题做出的相关反应，也就是说，解决方法总是滞后于问题的。因此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判断每种反应（方法）的得与失（优点与缺点）。得与失通常使用收益与成本的概念，且常常将其货币化。人们当然要选择最优的一种方法（即收益最大、成本最小的方法）。而在以往的政策分析中，最优选择的标准用社会总福利水平来衡量，这个概念会产生复杂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的最佳选择对于别人来说不一定也是最好的，所以，这种选择只有建立在相当多的假设前提下，才是社会最优。不过，假定决策者是仁慈的，出于促进公共事业的目的，问题导向政策分析是有意义的 (Grin, 2000)。

可见，经济学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分析上的优势主要在于可操作性，不过，也存在

^① Stokey & Zeckhauser (1978)、Hamburger (1979)、Hargreaves & Varoufakis (1995) 均转引自 Grin (2000)。

着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变量的选择问题。这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真实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影响需要模型相对简化。无论对于社会学、经济学，还是其它的学科，合理的简化是所有模型的关键。如何最有效地简化模型，首先面临的的就是选择哪些变量而舍弃哪些变量。一些变量必须可以用来直接或间接地解释语言政策所采取的措施。变量的选择也存在着优先的问题，政府总是倾向选择最具有政策解释力并且和特定形势相关的那些变量。语言经济学的变量选取有可能略掉一些社会语言学相关的变量，或和政治有关的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重要的。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可能忽视一些特殊的语言变量，不过由其它学科（如社会语言学）的专家通常不会遗漏。诚然，如果我们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可能存在的错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对这些变量给出一个一般性解释，再结合诸如人类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来。

4. 结语

本文在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规划经济学分析的意义和可行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对语言规划的传统分析和经济学分析进行了比较，讨论了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并对二者进行了沟通。结论是：语言规划是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它不仅是对语言本体的规划，更多牵涉到透过语言问题对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旨在影响人们对语言及其相关的选择，让语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语言规划跨学科的性质要求不断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充实与丰富其自身研究，特别是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合理有效的制定和应用上。而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范式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而且至少在两个方面显得有用处：一是在理解语言相关的选择过程方面；二是在选择、设计、实施和评价语言政策方面。

相对而言，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都比较薄弱，但与此同时，这也具有一种后发优势。国外的实践与经验表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能很好地应用到语言规划研究中来。如果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注意和借鉴此类研究^①，那么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效果都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改观。

^①目前已经有一些尝试，如张卫国（2008a，2008b）、薄守生（2008）等。

参考文献:

- 薄守生, 2008, 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J], 《制度经济学研究》20: 58-81
- 陈章太, 2005, 《语言规划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胡壮麟, 1993, 语言规划[J], 《语言文字应用》(2): 11-20。
- 刘海涛, 2006,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A]。载陈章太等(编), 《语言规划的理论 and 实践》[C]。北京: 语文出版社。55-60。
- 路易一让·卡尔韦, 2001,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M], 曹德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卫国, 2008a, 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 语言经济学的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 《经济研究》(2): 144-154。
- 张卫国, 2008b,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 一个初步框架。博士论文[D]。济南: 山东大学。
- 周庆生(编), 2001,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C]。北京: 语文出版社。
- Ager, D. 2001.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aldauf Jr., R. B. 2004. Language Planning[A], in Philipp Strazny (eds.).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C]. London: Routledge.
- Carroll, T. 2001.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Change in Japan[M]. Richmond: Curzon Press.
- Cobarrubias, J. & J. Fishman. 1983.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 Berlin: Mouton Publisher.
- Cooper, 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astman, C. 1983.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M]. San Francisco: Chandler and Sharp.
- Fishman, J. 1974.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M]. The Hague: Mouton.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Gottlieb, N. & Ping Chen. 2001.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East Asian Perspectives[M]. Richmond: Curzon Press
- Haugen, Einar. 1959.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3): 8-21
- Haugen, Einar.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n, F. 1995.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A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6: 227-231.
- Grin, F. 1996a.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21: 1-16
- Grin, F. 1996b.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Survey,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21: 17-44
- Grin, F. 1996c. Conflit ethnique et politique linguistique[J].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88: 381-396
- Grin, F. 2000. Supply and Demand as analytical Tools in Language Policy[A]. in A. Breton (ed.).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C]. Ottawa: Canadian Heritage.
- Grin, F. 2003.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 :1-66
- Grin, F. & F. Vaillancourt. 1998.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Policy: An Analytical Survey[OL]. <http://www.treasury.govt.nz/publications/research-policy/wp/1998/98-06> (accessed 01/04/2006).

- Grin, F. & F. Vaillancourt. 1999. The cost-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 policies: Case studies on Wales, Ireland and the Basque Country[M], Flensburg: European Centre for Minority Issues (ECMI).
- Halliday, M. A. K. 2001.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A], In Alwin Fill & Peter Mühlhäusler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 Haarmann, H. 1990.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ligh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86: 103-126
- Jernudd, B. 1991. Lectures on language problems[M]. Bahri Publications.
- Jernudd, B. H. & J. J. Das Gupta. 1971.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A], in Rubin &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C].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5 - 215
- Karam, F. 1974. Toward a defini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A]. in Fishman (ed.).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C]. The Hague: Mouton.103-124.
- Kloss, H. 1967. "Abstand Languages" and "Ausbau Languages"[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9):29-41.
- McManus, W. 1985. Labor market costs of language dispar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Hispanic earnings differenc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818-827
- Mühlhäusler, P. 2000.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cology[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 310.
- Mühlhäusler, P. 2003. *Language of Environment-Environment of Language: 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M]. London: Battlebridge.
- Phillipson, R.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Pool, J. 1991. The Official Language Problem[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495-514
- Rubin, J. & B. Jernudd (eds.). 1971.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C].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Scharpf, F. 1997. *Games real actors play: 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chiffman, H. F. 1998.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M]. London: Routledge.
- Tauli, V. 1968.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M]. Uppsala : Almqvist and Wiksells.
- Tollefson, J.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M]. New York: Longman.
- Weinstein, B. 1980. Language Planning in Francophone Africa[J].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4): 55-77
- Vaillancourt, F. 1996. Economic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Some Observations[A]. in *New Canadian Perspectives: Official Languages and the Economy* [C]. Ottawa: Canadian Heritage